



CHINA DEVELOPMENT BRIEF

中国发展简报

北京公旻汇咨询中心 编

www.cdb.org.cn

第49卷



● 关注

中国第三部门：在行政吸纳中走向依附？

深圳公益交流会观察

● 专题

垃圾危机：NGO吹响“集结号”

● 研究

小荷才露尖尖角：汶川地震对草根组织的影响

国内基金会参与私募股权投资浅谈

● 域外

求存之路：从一场自救运动看泰国抗艾滋病的倡导经验

中国发展简报

2011年 春 No. 49
www.cdb.org.cn

北京公旻汇咨询中心 编

内容提要

《中国发展简报》(中文)由北京公旻汇咨询中心编写,结合其网站(www.cdb.org.cn)为NGO的行动者和关注NGO的公众提供实时的有关发展问题的资讯、报道,刊载NGO自身发布的信息,并发布相关咨询意见和研究成果。北京公旻汇咨询中心还有选择地参与某些领域NGO的倡导行动,希望这些行动有助于改善NGO的总体生存空间和法律环境。

读者对象:社会发展及NGO领域工作者,广大社会公众。

责任编辑:龙文

文字编辑:盛燕

装帧设计:小笼包 智尚名扬

责任出版:卢运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发展简报. 第49卷 / 北京公旻汇咨询中心编.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1.4
ISBN 978-7-5130-0490-9

I. ①中… II. ①北… III. ①社会工作—中国—丛刊 IV. ①D63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58751号

中国发展简报(第49卷)

Zhongguo Fazhan Jianbao (Di 49 Juan)

北京公旻汇咨询中心 编

出版发行: **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马甸桥马甸南村1号院

邮 编: 100088

网 址: <http://www.ipph.cn>

邮 箱: bjb@cnipr.com

发行电话: 010-82000860转8101 / 8102

传 真: 010-82005070 / 82000893

责编电话: 010-82000887 82000860转8123

责编邮箱: longwen@cnipr.com

印 刷: 北京富生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5.5

版 次: 2011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4月第1次印刷

字 数: 160千字

定 价: 16.00元

ISBN 978-7-5130-0490-9/D · 1193 (3396)

出版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院外”游说：“两会”的民间风景

以往一年一度的全国人大、政协“两会”，除了北京交通拥堵和限行，对于普通百姓而言，并无其他更直接的感受。代表、委员见诸媒体的也大多是零碎的只言片语，很难窥见其有备而来的提案或议案全貌。媒体所冠以的“政治盛宴”一词应有它更合适的用处。而今年“两会”有关的报道和信息透出的两个看点让人觉得“两会”有了点儿可爱的模样。

第一个看点是网络流行的“两会”代表、委员雷人语录排行榜。也许，有些雷人语录经过杜撰、漫画式处理，距发言者的初衷已经相去甚远，但因为发言“娱乐化”，才吸引了更多的普罗大众的眼球。谁又能说，这些围观、争议和晒笑过程，不是议政、参政的启蒙教育呢。雷人语录是这个网络时代的产物，也未尝不体现了一个社会某种程度上对多元价值和声音的包容。

有代表说“这个问题这么敏感，你问我干什么？”这个言谈远比那种只是履行“举手机器”职责、满嘴空话套话打太极的参政议政者要真实得多。承认自己要回避敏感问题，但又不能占着位置不说话，于是，才会有将“扫黄”改为“扫色”、“不应该鼓励农村的孩子去上大学”、“取缔社会网吧”等等，这些有足够娱乐功能的话语纷纷出炉。而更有气势凌人的利益代言者，不再羞答答地谈论自己的利益诉求。代表或委员提案中，也有博得网友称赞的，如崔永元针砭时弊、充满社会关怀的发言。这些零七八碎又个性鲜明的“回声”，不管经过怎样的变形，还是显现出一点各自真实的模样，让会场之外的我们可以，去寻找能够与之共振的代表和声音。

第二个看点是场外游说的“民间谏客”。据媒体报道，民间立法参与者熊伟2007年搜集到十届人大近3000名代表5年来所提的5000多件议案的名目，

他发现约有2000名人大代表5年间未曾领衔提出过一件议案。而前20名人大代表领衔议案的数量，占总数的70%以上。

这边是有发声通道却无能力或者无时间，更可能是无意愿无议案的不作为，那边NGO像地质队员一样，到处勘探可以用来沟通、建言、倡导的地带，每年的“两会”已经成为很多NGO关注的地方。去年10月辞世的自然之友创办人梁从诫先生，就曾利用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递送了不少提案。

那些并无身份之便的NGO，多少年来也一直没有放弃这个通道。一般在每年“两会”召开很早之前，就开始联络委员、代表，沟通、写作议案、交提案，甚至还为委员联系、安排记者采访。寻找代表的方式也是五花八门，网络时代的微博等工具得到应用，有人还直接在QQ、MSN挂上“寻找政协委员”的签名，跨出熟人关系网路和地域。

无从统计NGO游说是否已经规模化，但这种现象已逐渐引起媒体的重视。今年“两会”期间，《中国青年报》、《南方都市报》、《时代周报》都对此予以关注，如环境领域“小南海”电站问题、垃圾分类回收、健康领域的罕见病医疗保障、乙肝病毒携带者就业……

当然，尽管这些“院外”游说活动多少有了点媒体效应，可实际效果还无从评说。递交罕见病医疗保障议案的瓷娃娃王奕鸥茫然：“一直没有什么动静，提了这几年，连罕见病的定义还都没有。连代表都不想再交这个建议了。”熊伟通过民间行动的形式推动立法10年，所推动的实质性的立法“连他自己都举不出一件”。NGO们明白，通过这个“两会”的特殊场合，吸引更多的关注也许是一个更实际的诉求。

“说了也白说，不说白不说，白说也得说”。在这里，除了重复梁从诫先生当年的话，找不到更合适的话语，来表达NGO行动者与他者的区别。尽管，这种改变缓慢和微小到自己不易感知的地步。但重要的是，唯有行动，才能带来改变。

时 讯	倍能转向学习网络 提升NGO影响力	1
关 注	中国第三部门：在行政吸纳中走向依附?	3
	深圳公益交流会观察	8
	中国民间志愿者试水非洲	11
	刘洁：去遥远的非洲分享生命、知识和技能	12
	万方：期盼到异域行走	13
	派遣中国志愿者将拓展中国公民全球扶贫和发展的新渠道	15
专 题	重回垃圾议题	19
	垃圾危机：NGO吹响“集结号”	19
	尴尬与期待	24
	银杏伙伴访谈	28
	梅念蜀：享受追求目标过程中的点点滴滴	28
	孙 恒：继续找寻工友之家的方向	30
	曾世逸：10年后催生出一个民办大学	33
	王奕鸥：踏踏实实把事情做好就行	35
观 察	参与式治理开花结果	37
	参与式治理：我们中国人能行!	38
	社区工艺坊：在参与中学习合作	41
研 究	小荷才露尖尖角：汶川地震对草根组织的影响	44
	国内基金会参与私募股权投资浅谈	50
域 外	求存之路	
	——从一场自救运动看泰国抗艾滋病的倡导经验	54
	医药专利：激励创新还是鼓励垄断	
	——一个待解的谜局	59
实 践	钱该怎么管?	
	——四川“5·12”灾后社区工作案例	62
	农民工子女教育公益现状随感	67
	“没有墙的世界”	
	——残障组织发起文物无障碍运动	71
书 介	权益失衡下的流动妇女土地状况	75
机 构	牵手陪伴生命的最后一程	78



倍能转向学习网络 提升NGO影响力

◎ 王 辉

2009年，致力于本土NGO能力建设的支持性组织——倍能组织能力建设与评估中心（以下简称“倍能”），在德国基督教发展促进会（EED）的支持下开展“中国草根NGO能力建设与共同学习”项目，为期三年。

不同于以往倍能所做的能力建设，该项目不再将关注点放在单个NGO能力建设培训以及辅导制定组织发展的战略规划等方面，而是往前更进一步，针对那些有了3年以上发展历史的机构，为他们提供同类组织学习网络的搭建支持以及辅导员培训，寄希望于这类机构“除了有资金或培训技术的支持外，还要成为自己行业网络发展的推动者。”倍能主任张菊芳介绍，建立学习网络的目的，是为了提高机构成长效率，分享有限的资源，通过大机构带动小机构，共同总结行业发展经验并共同面对挑战。这反映了

倍能在草根组织支持策略上的新思路。

目前，EED学习网络项目共有9家学习网络加入，涉及身心障碍、艾滋病、环保、农村发展等NGO领域。这些机构的组织形态和发展规模各异，有很多在此前都得到过倍能的能力建设支持。倍能在与它们长时间接触以后，发现仅仅为它们提供机构发展所需的某些核心模块技能是不够的，还需要使它们与同类的NGO建立学习网络，让原本单打独斗的组织各取所长，相互汲取经验，相互促进，共同成长。

2011年是EED学习网络项目实施第二阶段的第一年。元月，来自全国各地的脑瘫康复机构学习网络、自然之友会员小组学习网络、农民组织学习网络、中国各地慧灵学习网络、云南草根乐益俱乐部，以及贵州草根NGO交流网等7个学习网络聚集到一起，在回顾和分享过去一年的发展情况同时，还将学

习的重点放在如何提升网络的影响力上。学习网络的代表们，要“根据对各自学习网络的情况了解和发展所需，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向其他学习网络乃至未来的筹资方清晰介绍自己，锻炼提升自己网络影响力。”这正是项目第二阶段的要求。

为此，倍能邀请了南都基金会副理事长徐永光，以及腾讯基金会秘书长窦瑞刚进行了分享。徐永光在发言中回顾了自己的公益历程，从他从事公益事业的理念到机构发展的模式等方面的分享，都对参加者带来很大的启迪。腾讯基金会依托互联网企业的背景，在拓展品牌和影响力方面自然带有很强的信息时代特征。此外，一些在网络运行方面已积累了一定经验的组织或网络，如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自闭症支持网络“心盟网”、罕见病网络的负责人，也都和参与者进行了丰富的交流。他们的经验对于其他处于起步阶段的学习网络来说，更具有实操性，也更有亲和力。

无疑从部门差异而言，在提升影响力方面，企业在总体上要比草根组织更为成熟。所以倍能还跨界邀请了来自耐克和西岸奥美两家公司的代表分享如何建立品牌，如何扩大机构影响力。耐克公司的俞菲既介绍了耐克在公益项目拓展方面的案例和策略，还针对各个学习网络代表的自我介绍进行点评。

西岸奥美公司的代表则从品牌建设和市场营销的角度出发，向参加者介绍如何向受众传达其机构的价值理念，如何建立起与媒体，尤其是社会化媒体之间的关系，从而让受众清楚并关注机构所做的事情。这得到了腾讯基金会窦瑞刚的回应。他强调在人人

都是信息的制造者的Web2.0时代，学习网络应通过信息技术，与自己的受众、捐赠者以及相关利益者群体进行互动，他建议公益可以利用现成的公众关注度很高的Web2.0平台（社交网站）进行传播，而不是自建网站单向度地传递信息。

在最后一天，倍能安排学习网络的代表们对未来的网络发展方向和所需支持进行讨论。大家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例如，脑瘫康复机构学习网络希望增加传播官员来扩大本网络的影响力，而在培训中自始至终表示要成为农民朋友“自娱自乐”平台的农民组织学习网络代表，则认为目前该网络仍定位在“低调和务实”，以降低网络的敏感性。

同时，这些学习网络也希望倍能作为项目协调方继续给予支持，不仅给予小项目的种子资金支持，同时包括针对各个学习网络的能力督导，让这些散落在不同领域的学习网络组织可以真正成为一个大的网络和学习平台。EED项目还根据目前学习网络的发展状况，对余下的资源进行了分配，给贵州网络、云南网络、农民组织网络的运行配备70%的活动资金，给其他网络配备50%的活动资金。

在另一方面，倍能希望借此项目培养出一批NGO行业内的咨询师或培训师，希望他们既可以为其他组织提供支持，同时也可以以灵活多样的方式参与倍能项目的执行，一方面使他们能够得到锻炼和成长，同时也使倍能在服务领域上有所突破，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在张菊芳的设想中，学习网络还将推动公益组织与政府资源对接，并成长为行业协会的雏形。



中国第三部门： 在行政吸纳中走向依附？

◎ 付 涛

“至少从最近30年的发展历程来看，中国第三部门的发展不是‘独立发展’或‘自主发展’，第三部门还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依附性越来越强。”在2011年2月26日在京举办的《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2011）》（以下简称“观察报告”）新书发布会上，报告人康晓光教授一语惊人，引发了热议。

这份由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所长康晓光和公域合力管理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冯利博士主编的报告，通过总报告、分报告、典型案例、大事记四个部分，对中国第三部门的发展现状、未来趋势、外部环境进行了系统的观察和评论。报告以NGO的视角进行实证观察，以犀利的眼光和笔锋对公益领域的现状和热点进行褒扬或针砭，体现了明确的价值立场与导向。

对政府的依附性越来越强

“从发挥的功能上，在促进市场和经济发展、提供社会公共服务、引领和推动社会创新等对政府、企业有益的方面，第三部门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反抗市场暴政、参与公共决策、制约政府权力、促进政治民主化等反对或限制政府、企业权益的方面，第三部门能发挥的作用却很小（P35）”，“中国的现状是，倡导性组织得不到保障，当弱势群体的利益与企业、市场的利益发生直接冲突时，第三部门组织并没能为了弱势群体的利益奋起反抗市场暴政（P32）”。报告做出的以上判断，在当下三大部门跨界、融合的主流话语下，搅起涌动的波澜。

观察报告将第三部门置于为其提供资源并影响其变化的政府、企业、海外力量和公

众等几大环境因子之下，并观察它们的相互作用，以此分析第三部门的发展态势。报告认为，第三部门自主性和独立性的强弱，取决于行政权力对第三部门实施干预的程度，以及组织主导资源单一化程度。作者将“依附式发展的第三部门”作为总报告的标题，点明自己的结论。顺着其中的逻辑自然不难理解，作者在报告中始终拒绝使用“公民社会”的字眼，而只以“第三部门”指代的缘由。

报告认为，政府通过分类控制和功能替代策略等更为高明精巧的控制手段，培育“可控的”组织，在功能上替代、减少甚至消除“自治的”第三部门组织，成功地对社会进行了吸纳，造成第三部门组织缺乏自主性和挑战性。长期以来，第三部门在西方发展机构的影响之下，总体上接受了独立于政府和企业的思想和价值观，但在现实层面往往发现根本无法实现，出现了功能和认知失调。

对于目前多地出现的政府开放民间注册管理并大举采购民间服务的举措，报告一方面对其推动政社分离、强调专业化、引导机构治

理的规范等积极方面予以肯定，但同时也对第三部门进一步失去独立性表示忧虑。

事实上，伴随国际资助逐年大幅下降的局面，本土草根组织经过“洋奶”和“母奶”争论，已经开始将目光投向本土资源。另一方面，伴随政府采购民间服务的热潮，出现了政府自创组织，或者体制内组织纷纷社会化转型的现象。由于与体制的人脉关系和天然的政府信任，此类组织在竞标采购中尽管换了马甲，仍然处于垄断地位。这无疑给寻求“招安”的草根组织形成挤压。

近期在北京，残障服务领域内的部分工商注册的草根服务组织联名给主管该领域的政府组织写信，呼吁尽快落实注册难的问题。这不同于去年的宽松政策，今年政府在该领域内的采购计划，已将工商注册的组织排除在外，而在开放注册的政策已经家喻户晓的情况下，注册事宜并未落实。

此外，当草根组织被纳入体制内合法化生存，紧随而来的，一些草根组织可能面临妥协甚至放弃自己的价值观，压缩倡导功能，偏向社会服务的现实压力，以便获得现实的生存利益。这些组织需要具备更加高超的策略和技巧，才能化解压力下的焦虑。外力之下，公益组织，甚至单个的草根公益组织内部，出现分化已不可避免。

企业影响的两面性

企业也是影响甚至导致第三部门分化和不平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外部因子。企业（家）基金会大举进入公益领域，它们所倡导的跨界合作模糊了三大部门的边界，使公益更加主流化、大众化，推动了公益领域的创新和绩效运动，其进步意义不容小觑。在影响第三部门的环境因子的相互作用方面，报告认为，企业资源的进入，有助于减弱第三部门对政府和海外力量的依附性。同时，政府对企业的信任，可以为本土第三部门的制度环境松绑。



利弊互现的是，这加剧了公益组织对企业的依附性。报告认为，企业在投入大量资源甚至成立专门的公益组织推动第三部门发展同时，企业的理念和资本的逻辑也逐渐渗透到第三部门中。在降低第三部门对政府和海外力量依赖的同时，也使第三部门组织越来越理性，注重成本收益，甚至可能导致营利化倾向。此外，强化了第三部门组织的非挑战性，使其逐渐丧失对企业不当行为的挑战能力。（P66）

“政府保持中立的情况下，官工会形同虚设，民间组织无影无踪。”康晓光以此说明，缺乏独立性和挑战性的中国民间组织，并未能承担起倡导和代言的功能。这是一种功能失调的表现。报告在典型案例部分，特意将2010年劳资纠纷中工人的觉醒和集体行动，以及NGO的集体失声纳入观察。

对即将对第三部门产生全局性影响的企业（家）基金会，报告作者寄予厚望，期望它们真正成为社会的公器，促进社会福利最大化和社会进步。



随之而来的争论

发布会上，围绕依附性话题引发了争论，焦点落在两个层面上。一是第三部门是不是依附性越来越强，二是第三部门是否应当依附，讨论这个问题有无意义。

北大公民社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师曾志教授同意康晓光的判断，她认为中国的公民社会是表面上越来越独立，但这种独立富有中国特色。她提出，要认识和判断第三部门发生变化的内在动力和机制，可以从网民/国民（公民）的成长过程找到答案。网民（国民）的抗争行动是追求价值，还是追求利益？是追求国家的责任和义务，还是自我的权利？是否存在公民的共同体？如果抗争和反对还是建立在利益之争的基础上，公民社会就不存在。师曾志长期研究互联网和公民社会，她提请大家关注新媒体出现的价值，从主流媒体到自媒体发展带来了技术赋权的意义。

清华大学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主任邓国胜教授更为乐观，他认为官办组织去行政化的发展态势明显，草根组织独立性正在加强，因此并不同意第三部门依附于政府和企业丧失挑战能力的说法，认为应鼓励不同部门良性合作的关系。对中国第三部门较为乐观的学者们，通常会将汶川地震中公益组织和志愿者的大量涌现作为公民社会正在积极成长的例证（参见第51页《小荷才露尖尖角：汶川地震对草根组织的影响》一文）。

依附还是独立，这是一个问题

生存环境和资源来源导致了第三部门的依附性，但第三部门是否在价值观和精神上应该认同这种依附性呢？现场参会的几位学者在第三部门是否应该加强独立性、减少依附性上有着基本的共识，不过，腾讯公益基金会秘书长窦瑞刚表达了不同意见。

窦瑞刚强调，依附性是第三部门的天然属性，从资源来源已经表明依附于政府或者企

业，探讨第三部门的独立性没有意义。他进一步对“中国特色”予以强调：“中国的基础是君臣关系，父子关系，一定不是对抗性的，要建立相互的亲密关系，内部矛盾内部处理。”此言一出，北大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金锦萍忍不住回应：“放弃规则和底线，第三部门的发展就没有意义。”

南京爱德基金会的秘书长丘仲辉是NGO的实践者，他强调第三部门应该牢记自己的使命，有依附性就无法实现自己的使命价值。第三部门的使命价值，体现的正是与其他两个部门的差异之处。

在英国海外志愿服务社（中国）首席代表李国志看来，公民社会是制衡和监督政府和市场失灵的重要力量，对于政府和企业而言，需要制衡的力量去保持社会的平衡。以环保领域为例，关键还不在于有多少慈善资源从企业进入公益领域，而首先在于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是否能够承担社会责任。如果在这个环节做好了，也不需要我们的环境NGO在那里挣扎和抗争。

福特基金会驻华首席代表费约翰从资助和受助方的关系上去分析，他指出“洋奶”和“母奶”其实都会有问题，关键在于受助方对第三方（资助方）提出什么样的要求，受助方如何维护自主权。此外，费约翰认为，单个组织的自主性和公民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自主性是不同的概念，后者还包括文化上的因素。

他山之石

第三部门的独立性与资源来源相关，同时也与制度、文化和公民意识的觉醒程度相关。第三部门在资源上依附于政府和企业，并非中国独有。例如，在很多西方国家，来自政府的发展资金，占了NGO预算中的相当部分。但此“依附”非彼“依附”。NGO和国家的关系，除了资源关系，同时还受到法律和公民权利保护的调整，使其能够获得不同程度

的平等对话关系，对政策产生影响。

李国志说，西方国家的第三部门，既能够选择和政府进行合作，也能够对政府进行监督，甚至能够影响政府的政策制定和决策，影响其执政理念，但是仍然保持其独立性。例如，受到政府资助的有些英国NGO，每隔几年就会与政府讨论资助问题，续签资助协议，拿政府的资金从事发展援助，参加讨论和影响政府的援助方向。尽管这些组织的资金来自政府（比例不等，有些NGO50%以上的资助来自政府），但不能说，它们就是依附于政府，因为它们仍然有着一定的独立性和监督权。

与企业的关系也是如此。对NGO而言，单从技术层面考虑，争取资源来源多元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自己的独立性。“极端”一些的组织如绿色和平，拒绝企业和政府的资金，来自于分散公众捐款的涓涓细流，有效地保证了这个组织能够追求自身理念的纯粹性。从企业和市场的发展史来看，企业的社会责任很大程度上不是企业家良心和道德的自我发现，而是公民运动的压力结果。进而，慈善资本主义被引入公益部门，以大幅度提升慈善资源的使用效率。最终，还发展出像比尔盖·茨所倡导的“创新资本主义”，用公益精神改造企业，改造市场。（P64）

观察报告还试图从文化和公民意识的层面进行中西对比探讨，试图从根源上阐释中西慈善文化的差异。西方的组织和国家的关系，是权利制衡权力基础上的对抗性关系。第三部门的依附性话题在中国之所以具有特殊意义，是因为几乎在所有领域，“中国特色”必有投射，在非营利领域也不能外。但中国第三部门与其他两个部门的关系，大概既不是西方的对抗性关系，当然也不应该是康晓光说描述的，纯粹的依附和跑龙套。

无论如何，“中国特色”是受到西方权利为本和尊重个体的价值观洗礼的中国草根组织需要面对的现实。面对越来越强势的政府和

企业，挣扎多年试图迈向独立的第三部门，最终发现自己仍然面对强大的“中国特色”的宿命，不得不仍然在精神独立与行动依附之间的断裂地带焦虑。康晓光说，“本土组织如何加强自主性，坚持自己的理想、价值和目标，现在还没有答案。”

康晓光提醒我们注意悬在第三部门头上的透明天花板：制度的限制以及背后的文化传统。事实上，对第三部门来说，政府和企业，既非天然的敌人，也非天然的盟友。在动态的制衡中，社会才能在多元的声音下保

持健康和活力。

面对风云变幻的中国公益领域，北师大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说，2010年公益领域的重要变化，是在强化服务功能的同时降低了敏感性。康晓光则发出警示：“现任福特基金会首席代表费约翰曾说，‘减少对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依赖对国内非营利组织部门的健康成长与发展至关重要’，这句话意味深长。”康晓光认为，与此同时的挑战是第三部门即将面临政府权力和企业财富双重殖民化的危险（P115）。”

后记

报告在政府和企业大举进入公益，国际组织（资金）渐行渐远之时，公益领域正在面临重大变局的背景下出台，无疑非常及时。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副会长何道峰点明资助观察报告的背景：现在，第三部门资源潜力得到释放，可捐献的时间大幅增长，有非常大的空间和可能性，第三部门意识开始觉醒。但与此同时，社会幸福感在急剧下降，社会矛盾冲突集中爆发。社会的平稳转型变革，需要第三部门的理性选择和行动。何道峰认为，观察报告就像河道上的航灯，为大家指明自己所在的位置。他呼吁第三部门积极作为，唤醒角色意识并联合行动，让未来产生更好的选择。

为此，中国扶贫基金会将长期资助此项研究，对第三部门的发展态势进行为期10~20年的长期关注。北师大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高度评价对本土基金会有意识地支持独立的分析研究和报告的意义。福特基金会驻华代表费约翰也对此非常认同。福特基金会长期重视资助智库研究类项目，现在扶贫基金会的介入，体现了本土基金会视野开阔，试图引领行业价值的战略眼光和努力。

因篇幅所限，本文只着重于介绍总报告所重点覆盖的依附性问题，以偏概全，不及其余。从观察报告的其他部分内容来看，由于需要对议题进行聚焦，也为篇幅所限，观察报告并未能将业界普遍关注的其他一些重要议题全部纳入。相比之下，总报告较为理论化，分报告中的热点议题（现象）、典型案例、以及大事记等其他部分内容的选择和评议，均指向对公益领域发生重大影响的热点议题，强烈地体现了作者独立的价值取向、对现实的忧虑和人文关怀。例如，在众多风起云涌中出现的社会企业中，作者有些出人意料地选择富平学校作为其中的代表进行细致的案例剖析，可能体现了作者自己对社会企业的理解：富平学校始终将社会价值作为基本诉求，将商业手段作为辅助。在现实环境发生变化，面临重大调整之际，困惑这个机构的，仍然是如何将目标置于手段之上，甚至做好了这样的坚持可能会导致机构消失的准备。这些细致的观察和发现，值得细读去慢慢体会。报告试图对第三部门进行结构性和趋势性的把握，有利于阅读者（包括草根行动者）超越日常化的工作细节，在变化纷呈的公益格局中参照定位。

深圳公益交流会观察

◎ 王 辉

继2009年北京公益交流会（以下简称“京交会”）举办一年之后，背负着“打破NGO领域中资助方与受助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重任的规模性公益交流会，再度在深圳会展中心亮相。

资质审查

此次深圳公益交流会（以下简称“深交会”）由深圳市民政局、深圳市文明办、深圳市关爱办、深圳市民间组织管理局以及南都公益基金会共同主办，公益组织孵化器（NPI）承办，其政府主导的色彩与“京交会”由众多公募和私募基金会共同主办有着非常大的区别。

“深交会”开展前几天，报名参展的机构陆续接到组委会的通知，要求传真机构的营业执照或民政部门登记批文进行备案。这样的资质审查，让参展机构“紧张”了一下。

2月26日，已经做好准备赴深圳的慧灵各地机构，被告知不能参展。3月1日《公益时报》的相关报道称，为了让在各地的机构都能参展，慧灵以“中国各地慧灵智障人士服务机构”名称申报，但提交的却为青海慧灵的营业执照，因此未能通过深圳市民政局的审查。另外两家机构也遇到类似的情况。慧灵创始人孟维娜获知被拒的原因后，立即给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等人写信请求帮助。后来经过有关方的斡旋，这三家机构按照正常流程补办了一些手续，得以继续参展。

此外，组委会还规定，每个参展机构须有一家民政部门正式登记的社会组织推荐，另外，在机构展位的铭牌上，只能冠以工商注册或民政登记的名称，这对一些机构对外交流造成了一定的困惑。

例如，“爱聚（北京）咨询有限公司”和“北京新民思睿教育咨询中心”的展位前驻

足交流的访客，发现原来这就是“多背一公斤”和“21世纪教育研究院”。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在展示交流期间举办的沙龙活动也都要报审。种种举措带来的不便让参展机构恼火了一把，但大家基本又表示理解。

3月4日，深交会在深圳会展中心8号厅正式拉开大幕。共有160多家NGO参展，超过了2009年京交会的参展机构数量。展示的公益项目，涉及扶贫、环境保护、文化与教育、医疗卫生心理、扶老助残、专业社工服务、支持与研究以及综合服务八大领域。一些企业如沃尔玛，也在展厅的舞台区搭建了自己的展位。

然而，走遍整个展会，就会发现前来参展的非常少见关注劳工群体的民间机构，亦少见法律服务类的机构。对深圳这座拥有众多品牌商的代工工厂的移民城市而言，劳工在创造价值的同时，权益受到损害的情况也较为频繁，在独特的环境里孕育出不少为劳工群体提供法律维权、心理抚慰等服务的民间机构。它们因为敏感性而缺席，得到了当地业内人员的证实。

这从侧面似乎印证了不久前康晓光教授编写的《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2011）》里得出的结论：“政府针对不同的第三部门采取差别化的策略，来支持自己组建的第三部门，限制自发并挑战政府权威的民间组织。”

不过，在3天的会展期间，仍有未能获准参加的民间机构，自发前往展会并派发他们的机构简介单页，积极寻求机会与其他参展机构交流。

参展与主题活动同步展开 场内场外互动频繁

相比一年前的京交会，深交会创出了新的成绩，一共举办了5场论坛、8场公益活动和14场公益沙龙。据组委会统计，两天半的公众开放日，现场发放的免费门票超过2万张，远远超过京交会三天举办期间到会参观

的3000多人次。

深交会还在展厅里开辟出好几块公共区，供参展机构自发组织主持一些议题讨论或比赛活动。这几块公共区，分为舞台区、沙龙区和论坛区。两个在展厅的最里处用展板搭建出来的沙龙区，吸引了众多参展机构来分享、交流他们各自的项目经验，活动主题从公益组织品牌传播与筹资，到可可西里藏羚羊的保护，从认识读写障碍到关爱女性的乳腺健康等等，非常丰富。小到头脑风暴活动讨论身边的话题，启发创新行动，大到从社区发展层面讨论如何利用参与式方法，话题不一，够劲给力。

而在舞台区，则更多提供了体验式和参与式的活动。参展人员和社会公众都可以加入到这些活动中来，既可静静聆听环保摄影家的甘苦与感悟，体验残障家庭生活的角色模拟，更有带你回到童年的纸飞机大赛、寻宝游戏以及手帕DIY绘画等公众活动，好一派热闹景象。

相比较而言，展厅二楼的论坛活动令NGO更感兴趣。其主题往往与机构自身发展需要的各类资源有着紧密的关联度。所以更多的时候，这里聚集的人数要远远多于举办主题活动的沙龙区和舞台区。

在论坛区，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与如何利用IT技术推动公益这两个主题，分列两个会议室。论坛从早上至当天的活动结束，参会人数不曾减少过，足可见资源对NGO的魅力以及新技术给公益带来的发展空间被广为重视。

“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是由深交会论坛组委会主办的，来自南都、万通、西部阳光、腾讯、华夏以及千和等非公募基金会负责人，对非公募基金会的设立以及初步运作的经验进行了分享，希望为有意设立基金会的企业或个人提供借鉴。此外，发言者还与到场的参展机构同仁们就机构的项目如何获得资助支持等话题进行了更深层次的交流和互动。

在隔壁会场里与上述论坛同步开始的，则是NPI与微软公司共同举办的“NPO IT DAY”（非营利机构信息日）论坛活动，大约

有120人参与进来。他们与微软的员工志愿者分组讨论了民间机构的“筹款、筹物和筹人”三大主题，以及如何将信息技术管理更好服务于公益。在每个分组讨论发言后，都会有一名专业人士做现场的“IT诊断”。在随后的环节里，来自微软、淘宝网、以及Vjoin的代表分享了他们的亲身案例，让参与者受益颇多。

在“NPO IT DAY”活动中，参会者可以通过短信或登录搜狐微博网页发表现场感受，这些信息同步出现在会场的大屏幕上。如今微博一类的互联网交互平台，作为新媒体在当下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为公益机构重视。有趣的是，这几天的沙龙活动或论坛讨论，活动议题尚未结束，参会者已用自己的通讯工具同步微博直播，让未参加者也能有身临其境之感。

会场内，人来人往，人们穿梭在不同的展位前，或是驻足张望，或走近攀谈，赶集的模样好不热闹。会场外，热闹也在持续。这边有刚成立不久的壹基金公募基金会邀请参展机构到他们的深圳办公室，交流如何合作项目；那边则有来大陆发展的台湾慈济基金会，对参展机构发出交流邀请。而规模略小、互动频繁的小范围酒会联谊会更是接二连三。对一些机构来说，有时展会外的活动更有意思，收获不亚于展会内的活动。

逐渐倾斜的企业资源 NGO注册难依然存在

与京交会相比，深交会上企业的参与力度有加强的趋势，这跟企业对公益领域的日益关注有很大关系。在境外资金逐渐缩减和被限制进入后，企业资源的重要性渐渐被本土NGO意识到并加以重视，成为开启合作的新地带。类似的资源信息，如何去寻求合作，逐渐成为NGO关注的重点。深交会最后一天，NPI发布的《2011中国公益资源匹配报告》对此情况进行了回应。在之前的数次沙龙和论坛中，企业的声音对NGO来说不再陌生，随着企业CSR资源的进入也会逐渐放大。

该报告针对84家受访机构的调研显示，

公益组织从企业和基金会获得的资助占总筹资额的百分比比较高，分别达到32.7%和15.1%。换言之，公益组织的筹款来源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同时，从政府获得的筹资额度也在逐渐增加。但这些资源主要投入在环境保护和扶贫领域、社会创新、灾后救助等领域紧随其后，而在能力建设和医疗卫生心理领域的投入则相对较少。

但另一方面，报告得出了“民间机构的注册方式依然是受资助门槛之一”的结论，指出绝大部分资助方会要求受资助机构为合法注册的公益组织，其中六成资助方倾向于资助在民政系统注册的公益组织，而工商注册或未注册的组织获得的资源非常少。这个比例超过了资助双方在价值观、语言、需求出发点、话语体系等沟通上存在差异进而影响资助的比例（55.6%）。公益组织的筹资困难，八成的比例与“外部政策环境或自身机构注册方式”有直接关联。这印证了“注册难”仍是影响NGO生存的最大障碍。

此外，论坛承办方NPI还邀请了数家企业现身说法，讲述他们的合作案例，并与到会者分享合作经验。临近结束的时候，NPI创办人吕朝就这些案例给了参会者3次提问机会，但最终还是被提问者变成了“抓住一切机会宣传自己”的机会。这并非缺乏资源的草根NGO的“独家”行为。例如，在公益资源匹配报告发布前，NPI旗下的明善道社会责任机构就通过自己制作的视频，“软性”地传达先知先觉的企业已经接力公益的信号，希望借此让更多的企业加入进来，而这也将为作为中介性平台的NPI赢得更多的关注和合作机会。

此次深交会上，NPI还策划了一个“24小时筹款技能大练兵”的筹款活动，既给参展机构带来锻炼机会，也给公众带来了新的惊喜。数家公益机构在展会上贴出了岗位招聘启事但乏人问津。这种境况不由使人联想到2009年的京交会结束后，NPI出具的调研报告做出结论：没有一家机构在展会上招到合适的员工或

志愿者。

此外，一些机构找到了与政府沟通的机会。深交会结束后，孟维娜在一封邮件中透露，慧灵在参展期间，在自己的展位前与前来参观的深圳市民政局刘润华局长和马洪副局长深度交谈了40分钟之久。双方开放而坦诚地交流了自己的想法，赢得了彼此的尊重 and 了解。对方表示，“只要你想通了，（深圳市民政局）欢迎慧灵到深圳来落户开办服务”。

刘润华有这个底气对慧灵这么许诺。早在去年11月举办的中华慈善百人论坛上，刘润华就曾对外发出“做慈善，到深圳”的邀约。在政策环境上，深圳市作为经济特区，似乎正在利用其独特身份进行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的创新。自2006年起，深圳市开放行业协会组织在民政部门直接登记注册，到2008年颁发《关于进一步发展和规范我市社会组织的意见》，对工商经济类、社会福利类和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实行直接由民政部门登记，再到2009年，民政部与深圳市政府签订“部市协议”，鼓励深圳推动民政事业综合配套改革。正是在此环境下，壹基金与中国红十字会最终脱离挂靠关系，落户深圳完成公募基金会身份的转变。

此外，深圳如此超前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的还体现在对当地社工服务机构的大力支持上。目前，深圳有40多家社工服务机构，都获得政府购买岗位服务的支持。深圳市政府释放出的信号，吸引了很多NGO的关注，一些发展较快的机构，如NPI、映绿、倍能等相继在深圳注册并设立办公室。

深交会上，深圳市政府积极表态要给予社会组织发展的空间，甚至表示要在深圳常办这样的大型公益展会，让公众认识公益和参与公益，其表现可圈可点。有理由相信，在目前大环境下无法突破面临实质难题的现状下，这片曾是改革热土的深圳市，正在进行小范围的尝试和摸索，值得关注和期待。而深交会也许就是NGO与政府和企业加强互动的契机。

中国民间志愿者试水非洲



过去的30年间，通过VSO（英国海外志愿服务社）努力，已有750多位国际志愿者专家到中国服务。2月16日，VSO举办了一个发布交流会，宣布第一批来自中国的VSO国际志愿者即将赴海外参与国际扶贫和发展。这预示着中国民间层面的国际合作进程展开了新的一页。

2010年，经商务部批准，VSO（www.vsointernational.org）联合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北京市志愿者联合会、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志愿者工作委员会，首次面向全国招募中国志愿者派遣到VSO全球项目国家服务。2011年2月开始，刘洁作为艾滋病项目管理顾问到尼日利亚服务12个月。3月，万方作为发展咨询顾问，将用24个月在肯尼亚支持非营利组织的能力建设。

为此，《中国发展简报》试图将两位志愿者的个人故事呈现出来，看看她们远赴非洲之前，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同时，我们还采访了VSO的中国首席代表李国志，他就VSO近年来的战略转型、新的全球和在华定位、以及向海外派遣中国志愿者的开创性举措等议题进行了阐释和说明。中国民间志愿者试水非洲社区，标志着中国的视野更为开阔向外，不只是盯着政商经贸往来，也开始关注国际发展，在国际层面承担社会和谐的责任。中国将通过刘洁、万方这样的民间志愿者的交往，带给世界更为持久的价值。

对两位志愿者在非洲的志愿活动感兴趣的读者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她们，并给与她们鼓励和支持。刘洁：liujie.tracy@gmail.com；万方：highlandbarley@gmail.com。希望对VSO国际志愿者项目有更多了解的读者，可联系王庆华：wang.qinghua@vsoint.org。